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郭国祥¹, 俊萍²

(1.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郭国祥(1968-), 男, 湖南双峰人,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 俊萍(1955-), 女, 安徽濉溪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标志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种自觉探索的理论结晶的广泛认同。在新时期突出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强烈的自觉意识, 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关注, 同时这种表述也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归纳。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396-06

—

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整而彻底的世界观, 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 但它主要是根据欧洲国家情况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 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使之中国化, 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 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就提出, 对于社会主义, “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1] (第306页)。恽代英也指出: 要“寻求一个适合国情, 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2] (第258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 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 (第658-659页) (建国后, 该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者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 并不是随心所欲、突发奇想, 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用现

成公式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并接连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严重受挫。这一错误的主要责任者王明,不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1937年11月底回国后,仍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企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贯彻脱离中国实际的从共产国际搬回的经验、政策、主张。虽然这时他已从“左”倾变成了右倾,但根子还是教条主义。这时,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从遵义会议开始,已被逐渐克服;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由于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并未贯彻到全党,且也在实践中逐渐被克服。但是,对于这两次错误的性质,尤其对于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迷信共产国际指示和外国经验,更根本地说,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党内还缺乏统一的、深刻的认识,这严重影响着党的团结和党对革命道路的自觉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从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以往多年奋斗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相继发出号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3](第658页);“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4](第707页);“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5](第374页);中国共产党也要像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6](第803页)那样来工作;要按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样精神,“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5](第408页)等,都在革命斗争和理论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它的丰硕成果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并决定把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旗帜。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接着,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中国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7](第333-335页)刘少奇的这个定义,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中共七大党章,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二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它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中国革命的旗帜,从而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是,这种提法后来引起了苏共的疑虑。为避免所谓“民族主义”的指责,为了更顺利地获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也为了在全党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警惕个人崇拜思想的抬头,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取消了这种提法,换上了比较温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类的提法(当然实质是一样的),甚至在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也删除了“毛泽东思想”这一词条。当然,取消这一提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中断。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提法,而且

还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五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界定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江泽民在 2001 年“七一”讲话中则直接把它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 2003 年“七一”讲话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新时期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强烈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是一个独特的国情。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力非常落后，这就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可是我们过去却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把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公有制当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且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就导致“左”的空想错误或者说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和挫折。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再度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所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并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面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三个历史性的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实践无止境，社会生活鲜活而又生动，时代不断提出新问题，理论创新的步伐也必须加快。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烈的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强调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需要。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显得生机勃勃。过去苏共以大党、老子党自居，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喜欢干涉他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共产党组织的不安和强烈不满。国际共运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不能要求每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均按照同一种发展模式去发展。由于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每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也不同，我们的经验和创造对于别的国家有什么参考价值，那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事情。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8]（第 191 页）邓小平的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就是：走自己的路，既不照抄别国的经验，也不照搬别国的模式，也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正是吸取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避免把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夸大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这种提法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再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简化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语言文字表述，使其理论概括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和简明性。这一提法能够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成熟的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它们是同根同源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它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的整体脉络，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造的继承性、阶段性和连续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它有哪些深刻的内涵呢?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可以说是在党的文献中迄今为止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解释。它从理论、文化传统、实践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根据适用条件和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正确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对人类社会所作的深刻分析,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存在前提的个别结论和论断,如马克思不同时期给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行动纲领或革命措施。前两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们是各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而第三项则“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时代在变化,各国的国情也千差万别,如果简单套用,只会使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而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提供了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它不可能直接形成具体的行动纲领。因此,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第24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同形形色色的教条化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方面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反对某些人把他们的理论当做“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他们尤其反对欧美工人政党的某些领导人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到处搬用,当做超越一切历史条件、应对一切历史事变、适合于一切历史环境的“万能钥匙”。为此,他们殷切期望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85年,恩格斯在致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10](第669页)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艰难而又伟大的实践中,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并且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胜利。在中国,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沉痛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等。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运用;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发挥;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动力原理的具体阐述。三者有机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统一关系原理的体现和运

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历程,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就是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优秀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杰出代表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们不仅能够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也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熔铸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和认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对民族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毛泽东历来把科学地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他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第534页)毛泽东的著作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结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仅《毛泽东选集》第1-4卷引用的成语典故,出自《左传》的就有40多处,出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的就各有20多处。其运用之妙,赋予新意之绝,令人赞赏不已。邓小平也非常熟悉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异军突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礼之用,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成语或警句,经常被他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理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非常鲜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国智慧,“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重践履、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在邓小平理论中熠熠发光,这典型地表现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一国两制”的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江泽民也多次提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只有“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浸润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等等,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熔铸于一炉。

第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它面对的是自己国家实际存在的、特有的问题,它寻找的只能是适合自己并能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毫无疑问,它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实践,重视并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则凝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一国两制、关于改革开放等新的理论创造中,看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进入21世纪,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江泽民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提出,关于创新思想的论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定性,关于党的

性质、宗旨、纲领的新论述,无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

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经验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二者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有了“城市中心论”的失败,才有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自觉选择;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才有了后来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时,总是把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联系起来。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8](第234页)他一再强调说:“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8](第264页)由此可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概括和升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特点。

[参 考 文 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 恽代英. 恽代英文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叶娟丽)

Fro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 Marxism of China

GUO Guoxiang¹, DING Junping²

(1. School of Art &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GUO Guoxiang (196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rt &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joring in CPC's intellectual history; Ding Junping (1955-), fe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majoring in CPC's history.

s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dicated that CPC entered a new stage exploring China revolutionary of road consciously. The proposition of Marxism of China showed that CPC reached widely approval to the theory. In new period, we stress emphasize Marxism of China indicated that CPC had strong conscientious consciousnes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showed CPC's concern of sou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sports in the world, the statement also helped to further logic generalizat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of China. In the end,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intension of Marxism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y, cultural tradi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rxism of China; conscientious consciousness; scientific intension